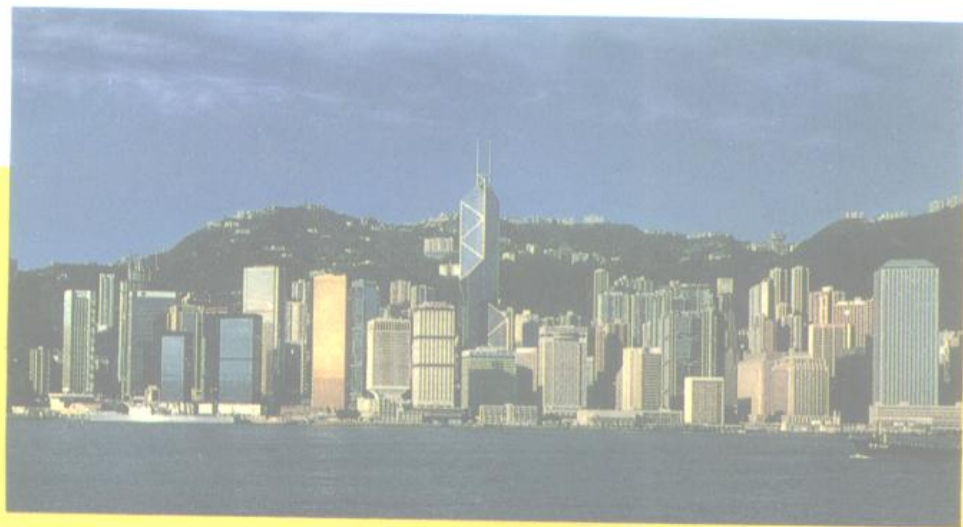


金应熙

香港

今昔谈



邹云海 金雨雁 金冬雁 整理

龍門書局

K296.58

4

93744

广东省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金应熙香港今昔谈

邹云涛 金雨雁 金冬雁 整理

龍 門 書 局

1996

(京) 新登字 306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中国著名史学家、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金应熙教授(1919—1991)在 1984—1991 年间有关香港史研究的学术专论、随笔、书评和杂忆等文稿,其中既有论述严谨的长篇,也有脍炙人口的短文。《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和《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两篇力作苦心孤诣,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炉峰话旧》和《沧桑史话》两栏的文章,虽短小精悍,但妙趣横生,意味隽永,堪为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佳作。

本书可供从事香港及香港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关心香港问题的各界人士参考。

金应熙香港今昔谈

邹云涛 金雨雁 金冬雁 整理

责任编辑 陈雨春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北京云浩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1996 年 2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6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

印数:1—1 200 字数:200 000

ISBN 7-80111-041-2/Z·28

定价:15.00 元

序 言

如果要回顾一生中欢乐欣悦的时刻,我便会举出 1963 年夏至 1964 年春。那时,我有幸和历史学界的一些朋友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为完成一项任务而在黎澍同志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队伍。队伍中有金应熙、余绳武、齐世荣、李龙牧、蔡美彪、张岂之、宁可、张文淳、刘祖熙、李嘉恩、洪兆龙、廖学盛等。应熙同志年龄居长,实际上,他当时也不过 44 岁,而其他人都 30 到 40 岁之间。这支队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交流思想、切磋学问,是紧张工作而又充满欢乐友情的青年之家,应熙同志是这个家庭中的老大哥。我们一起读书、写作、思考、讨论;一起散步、品茶、下棋、聊天。彼此专业相通、趣味相同、声气相应、友谊相投,似乎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道不尽的见闻史事。应熙同志阅历宽广、知识渊博、津津而道、谈锋甚健,给我们讲述许多新思想、新信息,大至世界要闻,小至生活琐事,使我们大伙往往莞尔而笑,眼界大开。

应熙同志是一位凝重宽厚的学者,彬彬有君子之风。他对待工作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待学问是那样谨严勤奋,锲而不舍,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中外古今,无不涉猎。他具有清晰的思辨、卓越的才干、真挚的情谊,体现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才华与美德。在我们那个小小的队伍中,每人都有自己的性格、风度,都有自己的专业擅长。而生活在一起,十分和睦融洽。应熙同志为大家所敬重、钦佩,他不仅在年龄上,而且在知识、品德上堪称是我们的“老大哥”。

三十年岁月匆匆流逝,应熙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今

天捧读他的遗著《香港今昔谈》，往事联翩而起，历历在目，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下来，每读几页，便不能不掩卷沉思，跌入遥远的回忆中去。读其书而思其人，这一篇篇文章是应熙同志晚年心血的结晶。他长期在香港生活，了解和热爱香港，从1984年后，全身心投入对香港史的研究。这部遗作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香港史的关注、期望和深情。他勤奋工作，搜罗资料，孜孜辨析，精心钻研，对香港自古迄今的历史发展作了全面而透彻的清理和分析，填补了我国历史研究中这片重要的空白。全书既有长篇学术论文，又有讲稿、随笔、札记、谈话、回忆等等，写作严谨而流畅，深入浅出，把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结合在一起。我在阅读时，感到犹如三十多年以前与应熙同志煮茗夜话，娓娓而道。应熙同志的文章像他的为人一样，谨厚纯朴而又生动清晰，使人如沐春风，如饮醇醪，怡乐赏鉴他建立的科学架构，既得到了知识上的充实和满足，又能引人入胜，趣味盎然。

香港史的编写是一项重要任务。天不假年，应熙同志未能完成他写作《香港史》巨著的夙愿，而八年功夫，收获甚丰，已为它奠筑了坚实的基石。到1997年，香港在被外国侵占一个半世纪之后就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全国人民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如同期待着远涉他乡、睽离多年而将要回家来的兄弟一样。应熙同志的《香港今昔谈》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真切而深入地认识香港的过去和今天，这对于增进全国人民对香港的了解，加强相互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应熙同志留下的这笔遗产十分可贵，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倍加珍惜。

戴 逸

1994年7月于北京

前 言

我的父亲金应熙教授(1919—1991)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而在我们的家庭中,唯独我没有研究历史,却转而学习自然科学并成为了一名分子生物学家。然而也许是由于从小受到父母亲的教育和熏陶,我对父亲的史学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只是在逐渐走上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以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父亲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他治学和治史思想和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十分相近。他一生的史学研究堪称通博,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宗教史、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史、中俄关系史、职工运动史、党史等方面。他既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留下了许多未竟的研究事业。

父亲的晚年主要致力于香港史研究,目前结集出版的就是他在1984—1991年间有关香港史研究的学术专论、随笔、书评和杂忆等文稿,其中大部分发表在粤港两地的各类期刊中,但也有一些从未公开发表过。文集中既有论述严谨的长篇,也有脍炙人口的短文。其中《炉峰话旧》和《沧桑史话》两栏的文章,虽短小精悍,但妙趣横生,意味隽永,堪为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佳作。

父亲对香港史研究的兴趣固然有国家及现实需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对香港的深厚感情和强烈使命感。他早有独立撰写《香港简史》和《香港通史》的宏愿,并留下详细的提纲,可惜一直为种种事务所累,始终未能如愿。在他留下的两篇香港史专论中,《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

望》一文写于他开始从事香港史研究之初,反映了他博学慎思、兼采众家之长的风格;而《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文则以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见长,该文敏锐地抓住香港当代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追本溯源,从史学的角度上清晰地勾勒出香港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结构变化,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父亲是一位富有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这不仅在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方面有所反映,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对青年学生、对公众的彻底奉献精神。他平生以传道授业为最大的乐趣,以提携后学、帮助他人作为最大的满足。他从不以大学问家自居,却从不放弃为学生、为公众服务的机会。只要是学生所需要的,只要是对公众有利的,他绝不因事小而不为,而且不论事大事小,总是戮力以赴,从不苟且。这部文集收录的《香港今昔》一文,就是根据父亲在广州图书馆为公众所作的讲演整理而成的;而文集中《炉峰话旧》、《沧桑史话》、《书海拾贝》几栏及两篇答问录,则主要是他应约为《紫荆》、《香港史话》及《华侨日报》等书刊撰写的,文虽短而足见其精神。

父亲对香港的深厚感情是由来以久的。早年英皇书院及香港大学的优良教育环境和许地山、陈寅恪、马鉴、连士升等名师的教导使他受益终身。直至晚年,他仍津津乐道于英皇书院式的通才教育,而对许师和寅老,其敬仰与怀念之情常常溢于言表。父亲执笔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收入本文集的《许地山老师与香港史研究》,足见他对许师的感情及许师对他的影响。父亲晚年还撰写过好几篇有关求学时代的回忆录,基本上都已收入本文集《求学追忆》一栏(遗憾的是,有关英皇书院生活的一篇回忆录一直未能找到)。这些回忆录中

有许多宝贵的史料，而字里行间，更洋溢着父亲对求学生活的怀念以及对老师、对母校、对香港的深情。每每读到父亲所追忆的许地山先生及英国学者傅朗思教授的一段段感人事迹时，我总是激动不已。可以说，父亲不仅继承了许地山等先生的宝贵学术传统，而且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造就了高尚的人格。

父亲在整个史学研究生涯中涉猎多个研究领域并取得累累成果。然而毋庸讳言，他并没有取得本应取得的更大成就，他留下的著述与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相比还是太少了。仅在香港史方面，《香港简史》和《香港通史》迟迟未能写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几年中工作任务的频繁变换，冲击了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也或多或少地降低了他的研究质量。父亲那种勇于开拓进取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然而频繁变换课题的情况在我国科学界已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对其消极作用和影响，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显然无力全面评价父亲在香港史方面的学术建树。前面所写的仅是自己的零散回忆和点滴感受，既聊以作为这部文集的前言，也寄托我对父亲的怀念。史学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是一项无尚光荣的创造性劳动。作为一名史学家的后人，我衷心希望看到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香港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金冬雁

1994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戴 逸
前言	金冬雁
学术专论	
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1
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	27
谈史论今	
一块石头上的奇迹	56
别了, 殖民主义时代	64
香港今昔	84
史苑随笔	
应该加强香港史的研究	119
关于英国法律与香港的问答	122
关于香港初期工业化的问答	129
书海拾贝	
一部介绍香港历史资料的好书	132
评冼玉仪《权力与慈善》一书	135
贵在探索, 精于思辨	137
《香港史图录》前言	148
《香港古今》序言	166
《香江夜谭》前言	169

求学追忆

香港大学回忆录	171
50 年前的港大中文系与中文学会	184
许地山老师和香港史研究	191

炉峰话旧

四五十年前的香港体育运动	198
早期的启德机场	200
从香港物价的变动谈起	204
30 年代的香港图书馆	207
香港的年花和年宵花市	210
1935 年的香港币制改革	213
香港与内地科技交流史的一页	216
湾仔今昔	219
30 年代香港的少年象棋手	222

沧桑史话

《香港史话》序言	225
香港史前文化	228
香港初期历史上的鸦片走私贸易	234
英占初期的香港“苦力贸易”	239
香港的开山填海工程	244
东华三院	249
初建港大	254
辛亥革命与香港	259

香港的初期工业化	264
战云密布的 1940—1941 年	268
1941 年底的香港十八天战役	272

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了。中英之间 100 多年来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此获得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随着人们要求增强对香港问题的认识,香港史的研究必将有较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我们对香港地区史研究工作进行回顾与展望,是适时的。

(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约从公元前 4000 年开始,它就是我国先民劳动、生息的地方。到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从秦朝开始的历代王朝一直对香港地区实施有效的行政管辖,经 2000 多年从未间断。英国在 19 世纪下半期,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了港岛和九龙司,又强行租借了新界。100 多年来,香港经历了转口港形成前时期、转口港时期和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时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重要工业、贸易和金融中心。香港历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也是大量的。近二三十年来,中外学者对香港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通史、分期史、专史各方面都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著作。

完整的(即从远古到当代)香港通史迄今尚未见出版。较有分量的带有通史性的著作,有安德葛(G. B. Endacott, 1901

—1971)的《香港史》⁽¹⁾和林友兰的《香港史话》⁽²⁾。

安德葛曾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关于香港历史的著述颇丰⁽³⁾,《香港史》是他的力作之一。此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比较丰富,包括英国殖民事务部和外交部档案、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会议录、港英当局年度报告、港英历年颁布的法律条例等。书中对香港史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港英的统治措施,考订和叙述大体上都还翔实,有些评论也尚公允,例如在第17页上承认所谓的《川鼻草约》“从未签订”。安氏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的重要性也是有所认识的,在全书28章中,他用了5章的篇幅去论述1841年以后香港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总的说来,此书对香港史研究工作者不失为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一本著作。但是,安氏不懂中文,对香港华人社会的发展不够重视,记述很少,在他看来,“香港的历史是从1841年英国人到来后才真正开始的”(见该书第4页)。该书的写作线索是以历任香港总督的任期来划分的,给人以殖民行政史的感觉。书中对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叙述虽比其他欧人著作多一些,但分量仍嫌不足,分析也欠深刻。该书大部分篇幅是讲19世纪下半期的香港史的,对本世纪的香港史论述甚少,在作者去世前定稿的增订本虽在这方面有所增加,也仍只占全书1/5。由于有这些缺点,安氏此书还未能使读者对香港历史获得全面的、正确的了解,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林友兰在《香港史话》的自序中表明,他这本书是为25岁以下的香港青少年而写的通俗性著作,目的是向“以中文为母语的市民”提供一本“用中文写成的香港史”。作者对普及香港史知识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作者另一部有关香港史

的著作是《香港报业发展史》⁽⁴⁾。此书的显著特点是着重论述华人社会发展的历史。虽然书中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还谈不上完备(例如对孙中山在香港的初期革命活动有所论述,而对1900年以后革命派在港活动史实则付阙如),但比之其他香港史著作则确已进了一大步了。该书出版于1975年,所以年代自1841年到1941年末日军攻占香港为止,1978年增订本又补写了6章,将叙述的年代下限延至1957年葛量洪总督的离任。单从该书来看,作者兼用中、外文史料,也吸收了当代学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总的写作态度还是严谨的,考订史实也一般可靠。该书的缺点,除对于英占以前香港的数千年历史几乎全未提及外,还沿袭了安德葛的做法,完全以香港历任总督任期分章,毫未考虑探索香港历史发展的分期问题。作者未将自己对香港的感情同对港英统治应有的认识作出区别,行文中不时流露对港英统治的片面颂美,陷于失实。

(二)

集中论述某一历史时期的香港历史的著作,远比通史为多。现分别就史前史、古代史、近代史等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评介。

不言而喻,史前史的写作要以考古工作为基础。香港的考古工作始于20年代中期。近60年来,韩以理(C. M. Heanley, 1877—1970)、肖思雅(J. L. Shellshear, 1885—1958)、芬戴礼神父(Fr. D. Finn, 1886—1936)、戈斐侣(W. Schofield, 1888—1968)和陈公哲等中外学者先后在南丫岛、大屿山、屯门等处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并写出了一批有一定影

响的学术报告^(5,6)。1955年,在九龙李郑屋村发现了一座东汉砖室古墓,由林仰山(F. S. Drake. 1892—1974)等主持发掘⁽⁷⁾,以后并辟为博物馆,出版了屈志仁(J. C. Y. Watt)的发掘报告⁽⁸⁾等。60年代,香港成立了考古学会,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而1971—1976年南丫岛深湾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则开辟了本区史前文化序列与年代的系统研究的门路,成为香港考古发掘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关于香港史前史的概述,以秦维廉(William Meacham)的《香港考古》一书⁽⁹⁾为较佳,作者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一般读者介绍了香港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香港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概貌。

香港史前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是香港史前史研究中最受注意的问题之一。我国林惠祥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此有重要的启发⁽¹⁰⁾。近年来,索尔海姆(W. Solheim)和张光直等知名考古学者曾在《香港考古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上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1977年第3期发表了秦维廉的《华南新石器文化中的连续性和地方性演变》一文,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并附有15位学人的评论及作者的答复。广东考古学界多年来也曾与香港地区同行开展有益的学术交流活动。梁钊韬⁽¹¹⁾、何纪生^①、杨式挺⁽¹²⁾先后发表了有关华南(包括香港)史前文化间相互关系的文章。总的看来,香港的考古发掘事业已经提供了对香港史前文化全新的认识。考古发掘的结果

①参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纪生先生所写《香港的考古发掘和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刊登于《学术研究》(内部文稿)1983年第6期)。

表明,香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及青铜时代遗址所表现的与广东大陆相同各期文化的同一性,是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新的历史见证。

香港古代史的研究则是目前香港史研究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这可能同过去人们对香港古代历史的重视不够有关。大致上说来,这方面的研究是迟至 30 年代末香港大学许地山先生才开始着手的,他曾发表过《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等文章^[13],对英国割占、租借香港地区的经过,以及香港的史前文化和若干史迹作了考订和简略的论述。

50 年代以后,研究古代香港的风气较前浓厚了。港大林仰山、罗香林、安德葛等开设了中国史课程,并从事香港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若干部有一定影响的香港古代史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1959 年,罗香林等的《香港前代史: 1842 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一书出版^[14],共收入罗香林、莫秀馨、张月娥等的论文 10 篇,对香港地区的地理、特产、历代建置以至迁海复界等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但因当时香港考古发掘事业还处在初期阶段,此书对香港史前文化论述较少;而对香港古代历史也主要着重史事考证,在结合经济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面也稍有不足。

随着史学家们的不断讨论与探索,对香港古代历史上某些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50 年代中饶宗颐、简又文、罗香林等就南宋末年香港地区情况(主要围绕南宋行朝是否曾驻大屿山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后分别出版了《九龙与宋季史料》、《宋皇台纪念集》等书^[15—17]。关于明、清两代在香港

地区的海防和驱逐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林天蔚^{〔18,19〕}、霍启昌^①、叶林丰^{〔20,21〕}、萧国健^{〔22,23〕}等分别根据中外文献或结合实地考察作了较细致的探究。但是,总的说来,香港古代史研究成果似乎主要限于史实的考证,尚待来者作进一步的突破。

族谱学的发展是推动香港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自罗香林等倡导利用族谱研究香港史以来,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和孔安道纪念图书馆经过有系统的搜集,已藏有广东省及香港地区的家谱资料 500 多种和各地同乡会、宗亲会会刊 400 多册,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香港地区族谱的研究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多年从事宗谱研究的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于 1968—1969 年间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对元朗、大埔、西贡、大屿山各处宗族和修谱实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每村、每姓都从始祖、族人、族长、宗子、构成、族规、祠堂、祭祀、族产、教育、宗谱、会议、婚姻、械斗等 14 个项目进行了解和记录。在调查中多贺获得钞本族谱及资料 30 多种,其中不乏香港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例如在《龙跃头邓氏族谱》中收录的邓观文《移村记》和《复村记》两文,即对清初迁界时新安界址和当时迁界复界实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记载。多贺调查情况已于所著《中国宗谱的研究》一书^{〔24〕}第六章《九龙宗族与修谱的研究》中作了概括的介绍。1981 年,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族谱搜藏工作,该中心并正在进行“从族谱研究香港前代史”的计划,由林天

① 例如霍启昌的论文《明代香港地方军政》曾在“香港历史和变迁中的社会”讨论会(香港,1981 年)上报告。